

公众考古学作为考古学的重要分支，近年来在中国学术界和社会实践中展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公众考古学》第二辑收录的文章涵盖了考古教育、社区考古、考古传播等多个方面，集中反映了中国公众考古学的发展状况，展现了其在实践探索与理念思考上的多维度进展。

大家心路

“大家心路”栏目汇聚了学界前辈的相关研究。《究天地人和，探古今之变——夏正楷先生访谈录》是对环境考古学大家夏正楷先生的访谈录，展现了夏先生的学术历程和环境考古思想的形成。他特别强调田野工作的重要性，提出“做环境考古的人首先应该是个考古学家”。在公众考古方面，他认为应关注考古过程和考古生涯的真实状况，并以夏鼐先生《敦煌考古漫记》为例，指出不仅要展现考古工作的精彩，也应如实记录其艰辛。

某种程度上，考古学家许宏近20年的经历是中国公众考古学发展的一个缩影。《“后记”·足迹·心路》一文摘录了许老师多钟出版物的“后记”片段，串联起作者的心路历程，也反映出在大的学术与社会背景下考古学的转变。

苏秉琦先生留下了大量与师长、同仁、后学的珍贵书信，这些资料对研究其学术思想形成及观察中国考古学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刘瑞研究员《苏秉琦往来书信集》的编撰，一文，从书信整理、时间对象、发表情况等方面做了详细记录，是珍贵的考古史料。同样研究苏秉琦先生，郝丽君、高丁丁的《苏秉琦与中国公众考古》一文，系统梳理了苏先生公众考古思想的根源、论述与实践历程，深刻揭示出：苏秉琦在明确中国考古学根本任务之初，就已蕴含公众考古的理念——必须让大家理解考古学，学科才能获得真正的发展和价值体现。

考古教育

作为考古学专业教师，冉万里教授《考古教学中的中华文明传承与表达》一文思考如何在教授专业学科知识的同时，融贯家国情怀与弘扬中华文明等教育理念。他借助大量历史时期的考古实例，潜移默化地将中华文明的一脉相承性、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等关键问题寓于教学中，既增长学生学识，又强化民族文化自信。

《中英早期田野考古实践与教学：一个比较考古学的案例》聚焦吴金鼎、曾昭燏、夏鼐三位先生20世纪30年代在伦敦的学习经历，通过跨文化比较，揭示了英国考古学对中国现代考古学形成的影响。《“涇滨考古初启蒙”——夏鼐先生的第一次田野考古实习》一文以《夏鼐日记》为基础，深入考察了夏鼐先生1935年在安阳殷墟的首次田野实习，有力阐释了田野考古实践在考古人才培养中的核心作用。

《高校考古历史实践探索——以郑州大学历史情景剧大赛为例》一文则展示了专业“第一课堂”之外，考古教育丰富的“第二课堂”。已连续举办14年的历史情景剧大赛在普及公众历史文化知识、培养爱国主义情怀、助力地方学科建设以及弘扬人文精神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同样作为重要的“第二课堂”，博物馆在激发学习兴趣、培养实践与创新能力方面作用显著。《博物馆教育中嵌入项目式学习的意义及策略》一文指出，博物馆开展项目式学习应落实五个基本策略：确立合适主题、明确目标指向、创设真实情境、聚焦核心作品、重视学习评估。这种模式能有效促进学生学习状态、内容、方式和结果的变革，通过小组合作研究、充分释放博物馆在学生培养中的价值。《新视野下“南南考古学院”公共考古品牌创新实践与思考》《从展厅到工地，构建考古研学体验营——国博考古研学营的实践与思考》《博物馆学术讲座品牌发展探索——以安徽博物院安徽文博讲堂为例》三篇文章，分别介绍了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国家博物馆、安徽博物院三家单位的公共考古品牌创新活动，体现了考古教育在形式与内容上的多样化探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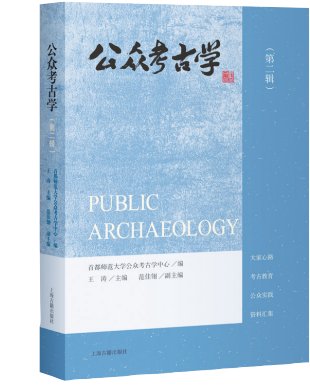
社区考古

社区考古日益成为中国公众考古发展的重要方向。《在地社区公众考古教育的实践与反思——以河南中牟业王遗址为例》和《遗址在地社区考古专题展初探——渚城马道坪遗址社区考古实践》两篇文章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考古工作如何与在地社区建立良好互动。前者以业王遗址为例，系统分析了公众考古教育在内容设计、形式创新、效果评估等方面的经验与挑战，特别强调要破除对公众的偏见，认识到公众是具有主动学习能力和多元需求的参与主体。后者详细记述了在马道坪遗址策划实施社区考古展览的过程，其倡导的“将考古信息融入社区日常生活”理念以及通过展览建立情感联结的做法，为其他社区考古工作提供了有益参考。

《社区公共考古模式探索——以刘家洼墓地为例》同样聚焦社区互动。作者在调

公众考古学的多元探索与实践路径

王涛



研宣传中发现，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将刘家洼墓地遗址的文化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文章揭示并探讨了在保护弘扬考古遗产与改善民生水平这对矛盾中，仍存在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

考古传播

考古信息的传播媒介与方式正不断拓展。《公众考古类新媒体平台的调查与思考》关注了微信公众号和微博平台上的公众考古类账号发展状况。《中国考古现场直播发展趋势与问题探讨》一文梳理了我国20余年考古直播的演变历程，指出其直播时长增加、内容更加深入、播出形态更加多元、平台也从单一电视转向全媒体共同参与，呈现出普及化、多样化态势。

《2021 首届北京公众考古季举办侧记》记录了一次省级大型系统性公众考古活动的新模式——包括公众参与、考古体验、专题展览、云端展示、学术讲座等多种形式；还详细介绍了策划思路、实施过程和成效评估，并突出强调了媒体传播对扩大活动影响力的关键作用。

理念思考

随着实践的深入，学理层面的探讨也随之深化。张颖岚教授的《立场与观点——关于公众考古学的几点思考》围绕学术纯洁性与社会功用性、权威话语权与公众参与权、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信息真实性与客观性等多重关系展开论述。他指出，“公众考古学”或“公共考古学”在协调考古学与社会需求时，必须同时坚持学科的独立纯洁性、履行历史使命，并思考其公共价值与社会意义，承担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

《景观社会视域下的公众考古探索》以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理论为基础进行反思。文章认为当前中国公众考古学潜力巨大但也面临危机，应在发掘、保护、传播各环节坚守科学严谨原则，避免过度包装和景观化；需深化考古成果的研究解读，防范过度商业化、娱乐化。《基于情境理论的公众考古学实践——以洛阳古墓博物馆为例》借鉴情境考古学与情境学习理论，深入剖析了该馆“博物馆奇妙游”项目的设计理念与实践成效；论证了情境理论应用于技术、参与式体验、空间延伸等维度，在创新公众考古实践、增强文化传播效果方面的有效性及未来潜力。

《中国公共考古学发展现状及趋势研究——以历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公共考古专业委员会学术研讨为例》《从美国考古学会(SAA)第88周年会看公众考古学》两篇文章均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分别梳理了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中公众考古的研究焦点和主要关注领域。后者重点介绍了美国公众考古学界的成果与动态，其多元视角可为我国的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结语

纵观本辑文章，中国公众考古学当前发展呈现出如下鲜明特征：其一，实践模式正经历从专家主导的单向传播向重视公众主体性的双向互动转变；其二，公众参与考古的形式与渠道日益多元，从传统讲座、展览延伸到考古体验、研学旅行和新媒体传播，数字技术的应用更开辟了全新空间；其三，社区考古的受重视程度显著提高，且更加关注与在地社区的融合互动，探索考古成果惠及社区的路径，体现了学科的社会责任意识；其四，公众考古活动正从零散化走向系统化、品牌化，标示着对长效运营和体系构建的追求。

公众考古学的发展，不仅关乎考古学科自身的完善，更是推进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增强民族文化认同、赓续中华文明的关键途径。本辑文章从多维度展现了该领域理论与实践交融的丰硕成果，同时也提出了诸多有待深入探讨的课题：如何建立科学、量化的公众考古效果评估体系？如何在坚守学术专业性的同时，有效提升公众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怎样更好地协调考古学研究目标与公众文化需求的关系？如何推动公众考古工作更系统、深入地融入公众项目的整体规划与执行流程？这也是《公众考古学》辑刊持续关注的问题。

【本文为《公众考古学（第二辑）》卷首语，发表时有删节】

编：首都师范大学公众考古学中心
主编：王涛
副主编：范佳翎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5 年 9 月

构建知识体系 激发专业兴趣

——读《写给青少年的考古书——人类的过往》——

李想

近年来，随着“文旅热”“博物馆热”的兴起，公众对考古学的兴趣日益浓厚，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轮轮“考古热”。面对公众的热情，考古研究机构、博物馆、高校、媒体等开展了诸如考古VR、考古盲盒、考古现场直播等形式多样的公共考古活动。这些活动以极具时代气息的酷炫形式，让考古学走出“学术象牙塔”，让考古工作者走出田野，拉近了考古学与公众的距离。

然而，不同于“文旅热”“博物馆热”，公众真正接触考古发掘的机会少之又少，“考古热”主要借助媒体尤其是一些自媒体的宣传与推广。在当下将“流量”奉为主臬的时代，为了“博眼球”吸引更多流量，一些媒体往往热衷于报道考古出土的“珍奇异宝”，或是借助公众耳熟能详的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为考古遗址制造“噱头”，抑或是毫无根据信口开河地将三星堆遗址称为“外星文明”。诸如在考古直播时邀请擅长撰写盗墓题材小说的作者为嘉宾等，让人啼笑皆非的操作，更是屡见不鲜。“流量”催生下的“考古热”，一言以蔽之，乱象丛生。

当“猎奇”“噱头”成为媒体报道考古学的“流量密码”后，考古学传播碎片化、泛娱乐化、极端化日趋严重，公众通过媒体所获得的考古学知识的科学性、准确性和客观性大打折扣。长时间、大规模诸如此类带有偏见的资讯传播，让对考古学不甚了解的公众产生误解，认为考古就是挖宝，更有甚者认为考古是官方盗墓。为了避免出现瓦釜雷鸣、黄钟毁弃的局面，不让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不懈努力取得的成果付诸东流，考古学者有必要挺身而出，及时向公众传递科学、准确、严谨的信息，以纠正媒体的信息传播偏差。

日前，读到青年学者张旭博士撰写的科普读物《写给青少年的考古书——人类的过往》（以下简称《人类的过往》），该书结合学科发展史以及大量考古实例，以生动的语言和前沿的科技视角，带领青少年读者探索奇妙的人骨考古学世界，从基因解码到面貌复原，科学、系统、全面地介绍了人骨考古学。

人骨考古学是以考古发掘出土的人类骨骼为主要研究对象，运用体质人类学、统计学、古病理学、分子生物学、骨化学等多学科研究古代人类的迁徙与融合、健康状况、社会结构、生业模式等，对人类演化、古代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科学依据。此外，通过对古代人类骨骼研究还可以为现代医学提供借鉴和参考，有助于了解人类疾病的起源、流行和治理。

人骨考古学是现代考古学的重要分支，它的诞生和发展，之于考古学意义重大。首先，它让考古学回归了对“人”的关注。考古学的本质是根据实物遗存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学科，但传统考古对“人”的认知多依赖间接证据，而人骨作为古代人类的直接遗存，填补了考古学中“主体缺失”。其次，它拓宽了考古学的研究维度。传统考古学更多关注古代物质文化、生业模式、空间布局等，人骨考古学使考古学对古代社会的解读从“物质表象”深入到“人的行为机制”，实现了从“是什么”到“为什么”的深

化，让我们对古代社会的理解更立体、更系统。第三，它推动了考古学研究方法的革新与学科融合。人骨考古学的发展以“问题驱动”推动技术革新，引入的跨学科方法不仅革新了自身研究，而且使考古学从经验性描述走向科学性实证。

《人类的过往》目标读者是对考古学知之甚少的青少年，如何将晦涩难懂的人骨考古学的学科意义和方法论说清楚、讲明白，是这本科普读物面临的最大挑战。其实，如何将考古学知识化繁为简，也是公共考古下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现今社会流行的“考古热”看似热闹，但大多是凑热闹，公众对考古学的认识还停留在表面。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学术史储备丰富和学术视野广阔的作者提出了解决方案，他将复杂的知识点拆分开来，借助诙谐有趣、通俗易懂的文字，以及考古实景图 and 据此创作的漫画，巧妙地融入“什么是人骨考古”“人类演化”“如何识骨识人”和“古人生病的证据”等章节，并借助大量的考古实例和知识链接，与读者一起构建一套系统、全面的人骨考古学知识框架，让读者“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真正做到知识传播的系统性和全面性。整本书严谨不失风趣，科学融合人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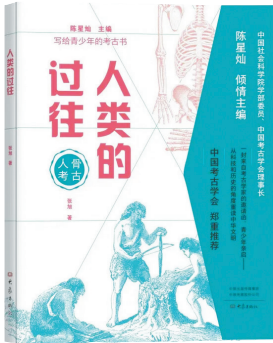
细细品读，作者的叙事方式，与教育学中常提到的建构主义十分吻合。所谓建构主义是学习理论中行为主义发展到认知主义后的进一步发展，强调个体在认知和理解世界时的主观能动性。建构主义认为人类并非被动地接收外界信息，而是通过自身的经验、思考和交互，主动地构建对世界的理解和知识。建构主义教学是自上而下的过程，以问题为起点，通过学习者的经验和实际的情况，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而构建起知识的框架体系。建构主义教学方式充分发挥了学习者的自主性，教育者只是一位辅助者，要创造情景，激发学习者的兴趣和学习热情。

《人类的过往》开篇以青海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的喇家遗址出土的特殊形态人骨为引子，作者据此不断提出问题引发读者思考，希望读者根据已有的认知结构，有意识地和有选择性地理解和建构对人骨考古学的认识。紧接着作者用通俗的语言以探讨式的口吻对“人骨考古学”的相关概念进行解释，好似与读者进行“无声”的互动，让他们检验自己通过阅读所获得的认知结构。

诚如建构主义主张的那样，事物的本质是复杂的，知识建构也是多样性，作者并不局限于用一种方式去启发读者，而是在不同章节中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引导读者去探索人骨考古学。在“人类演化”章节，作者通过展示不同时期人类骨骼特征的变化，让读者理解人类在漫长历史进程中的演变规律；在“如何识骨识人”里，又借助具体案例，如通过骨骼的损伤情况推断古人的生活方式和社

会地位，帮助读者了解从人类骨骼中可以获取哪些信息。

在“古人生病的证据”这一章节，作者更是巧妙



一样，根据自己的思考和探索，逐步构建起属于自己的人骨考古学“知识大厦”。

同时，作者还注重知识的拓展和延伸。在每个章节中，都会设置知识链接版块，介绍一些与该章节内容相关的前沿研究成果或有趣的考古故事，进一步激发读者的好奇心和探索欲。这样一来，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就像是在进行一场知识的探险，不断地发现新的宝藏，从而更加深入地理解人骨考古学的魅力和价值。阅读这本书仿佛置身于考古现场，和作者一起化身为穿越时空的“侦探”，抽丝剥茧探索古代人类社会的真实面貌。

这本科普读物让我不禁想起了初中时阅读到的一套人文社科丛书《大家小书》，这套书以“大家写给大家看的书”为理念，将艰深晦涩的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领域的学术成果转化成通俗易懂的语言，兼具学术性与普及性，同时具有很好的传播性。相较于历史、哲学、艺术等学科，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理论离公众生活更远，更需要专业人员站在更高的高度，深入浅出地为观众梳理学科的脉络，与读者一起构建对考古学的认知体系。

《人类的过往》以其独特的叙事方式和知识建构方法，为青少年打开了一扇通往人骨考古学世界的的大门。它不仅解决了将晦涩知识通俗化的难题，还让青少年在阅读中真正体会到考古学的乐趣和意义，为公共考古的发展提供了一个优秀的范例。诚如孙庆伟教授所言：“中国考古学从来不是沉迷于锱铢考证、‘为研究而研究’的乡愿之学，也不是简单堆砌资料、‘见物不见人’的泥古之学，而是赓续文脉、传承文明的经世之学，是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的强国之学。”走向群众、回报社会才是考古学的最大初心。“考古热”不应缺少考古工作者的身影，公共考古亦是考古工作者的职责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写给青少年的考古书》是一套丛书，除这本《人类的过往》外，还有《与动物为伴》《沉默的历史》《星空的启示》《城墙的内外》。这套丛书将从不同的角度系统、科学、全面地描述现代考古学的面貌，让读者切身感受到考古学的魅力。科学与历史交汇、技术与人文共舞。期待今后能看到更多的专业人员撰写的考古学科普读物，让“考古热”真正热起来。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写给青少年的考古书——人类的过往》

主编：陈星灿

作者：张旭

出版社：大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5 年 7 月

■ 编辑手记

从袞衣绣裳解码文明经纬

——读《袞衣绣裳：中国古代服饰》——

马晓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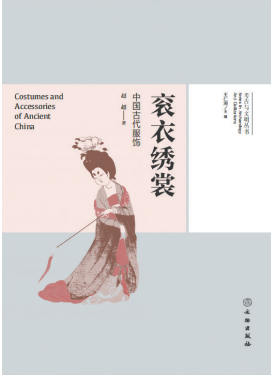
《春秋左传注疏》有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服饰，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不仅是遮体避寒的实用之物，更是中华文化的载体和历史的见证。《袞衣绣裳：中国古代服饰》一书以时间为主线梳理我国各历史时期服饰的发展演变，兼顾各民族服饰特点，并以专题形式对各时期服饰的主要特征进行详细阐述。通过考古发现实例与古代文献记载，同时结合诗文和服饰背后的故事，让服饰形象和史传诗得以互证，以图文结合的方式、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大众普及中国古代服饰的发展历程。

通读全书，不难发现，古代服饰体系的发展脉络复杂繁复，其演变不仅涉及款式形制、面料材质、织绣工艺等多个维度，同时正如书中对古代服饰的讲述也不局限于衣服本身的发展，配饰、妆容和相关物件也与衣服形成一有机整体。相比衣服形制明显的改变，它们看似零碎微小，在服饰历史的宏大叙事里似是一抹淡淡点缀，但实际上它们同样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同样受宗法礼仪、社会环境、文化观念的影响，是社会身份与文化修养的外在彰显，具有更深刻的符号学意义。

譬如纹饰之于服饰，服饰从最初的遮体御寒，到兼具更多的社会文化意义始，纹饰即作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元素，在千年的演变中，既有传统继承，又有各时代独有的特色。

上古时期，人类以自然之物直接蔽体。先秦时期，几何纹饰盛行。三星堆青铜立人像的龙蛇纹腰带与兽面冠饰，可见此时纹饰直接源于自然崇拜，也印证了纹饰早期兼具宗教和阶级标识的双重功能。殷墟妇好墓玉人服饰的饕餮纹、目雷纹，揭示了商代纹饰已从原始图腾向等级符号过渡的工艺进化。从文化角度而言，孔子最早将衣服与秩序、礼仪紧密相连，赋予了服饰深刻的文化与礼制内涵，同时这也为后续衣服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十二章纹所谓“黼黻文绣之美”自西周起就一直受到历代统治者与舆服制度纂订部门的重视。

南北朝时期胡汉杂糅，服饰体系首次出现双轨并行，是我国服饰中的重大变化。至汉代，服饰以质朴、大气为特点。虽然服装样式上各级官员无明显区别，却能通过冠帽和腰带体现等级品秩。可见，服饰绝不仅是单一的衣服本身，而是通过整体造型的综合性表达。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丝织品堪称汉代服



饰纹饰的巅峰之作，“乘云绣”将凤鸟、流云、卷草等纹样通过不同的绣法表现得栩栩如生，既延续了先秦时期对神灵的崇拜，又融入了汉代“天人感应”的哲学思想，以及纹饰向世俗化、生活化的转变。

唐代是中国古代服饰发展的鼎盛时期，其服饰风格开放、包容、华丽，服饰款式更加多样。单从纹饰角度看，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缂金绣衣物，以捻金线在丝绸上绣出鸾鸟、花卉等纹样，尽显盛唐气象。另外，绣花印染纹样中除了龙凤、蝴蝶、蔓草等传统纹饰外，还有狮子、葡萄、宝相花等外来元素，另如可当唐代织锦的最高水平的陵阳公样，均可见当时经济繁荣、中西文化交流的兴盛之景。

宋代崇尚理学，冠服制度上保持传统，但日常衣裳则一改前朝风格，趋于简约、典雅。同样，服饰纹饰样式更注重写实，风格趋于素雅，多为缠枝纹、折枝花纹、云纹等。黄升墓出土的牡丹花深烟色罗背心等随葬服饰，不仅体现了宋代服饰精细的制作，亦是当时精神文化和审美的直接反映。

明清时期，服饰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注重细节与装饰，同时更加凸显专制对其影响。明代的袂裙、凤冠霞帔，制作工艺精湛。清代的旗装，蕴含了独特的民族特色，也是在与汉族文化的交融中不断演变。纹饰方面，严格的等级制度形成了以不同形式的龙纹和补子纹饰来区分皇室和文武百官。同时，纹饰题材更加广泛，吉祥纹饰通过谐音、象征等手法表达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而我们能看到这些纹饰的传承演变以及各朝代不同的风采，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经济和手工业的发展带来的服装质料和纺织印染工艺的革新。

从早期的绘、染、绣，到后来纺织技术的不断提高。“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臂上的复杂纹样，因汉代提花织锦技术的成熟才得以产生。唐代国力鼎盛时，大量精美的纹样与繁复的刺绣图案装饰在高级衣料之上。同时，开放包容的文化环境也使得缂金绣、蜡缬等新兴工艺传入并得到推广，进一步丰富了服饰纹饰的种类和风格。宋元时期，除各式锦缎外，缂丝、织金等工艺的提升，都使得服饰纹饰更加精美绝伦。

颜色作为服饰中的重要元素，不仅反映了当时的染色技术水平，同样蕴含了丰富的思想内涵。正如书中所述，中国传统的服装色彩，受到古代阴阳五行思想的影响，以赤、黄、青、黑、白五色为正色，构筑起中

国传统色彩体系的基石，承载着古人对天地自然的敬畏与哲思。颜色首先成为礼制的直接显现。服色被认为与“五德终始”相关联，各个朝代被认为受五行影响，如秦以黑为水德，汉初袞素，至武帝改土德尚黄，使得“易服色”成为与“改正朔”并行的政治仪式。此外，各朝都对各级官员的服饰颜色有严格要求。春秋以降，服色以正色为尊，间色为卑。孔子言“恶紫之夺朱也”。至隋唐时期，朝服中出现了紫、绿等复合色，且以紫色为尊，这或是与佛教文化传入有关，但祭祀等重大场合仍以正色为尊。唐之后，黄色开始作为皇室专属服色，至清代更细分为明黄、杏黄、金黄、香色四色，分别对应不同等级皇室成员，对黄色的使用规范达到极致。

另外，染色技艺对于世俗服饰的影响更为明显。中外交通兴盛使颜料更加多元，服饰色彩更加鲜艳，同时让原本仅供贵族使用的绯红、绛色，逐渐走入寻常百姓家。隋唐文献记载的猩猩血、紫胶、龙血、青黛、藤黄等染料，丰富了服饰的色彩。宋代印染技术发展，衣料多采用变化多的间色染成，如淡绿色、粉紫色、银灰色、葱白色等，颜色以素雅与质朴为主，反映了“存天理，灭人欲”在抑制奢华风气上的影响。从秦汉的“苍头黔首”到明清的“蓝衫布衣”，染色技艺的每一次进步都直接转化为世俗服饰的色彩革命。

此外，妆容虽不属于服饰本身，却与服饰形成了和谐统一的整体。不同朝代的妆容风格，亦折射出当时的社会风气与审美趣味。唐代，经济发达，服装式样花色层出不穷，发式、妆容也更加丰富。唐代女子盛行的“啼妆”“飞霞妆”独具特色，花钿、斜红、靥钿等面饰更是为妆容增添了别样魅力。对于唐代上层社会的女性而言，每一个方面都极尽奢华。如在唐代绘画作品中花钿就有30多种形状，流行色也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变化。现存的诸多壁画、绘画中，如书中多处提及的周昉《簪花仕女图》、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等，都有表现唐代女子华丽的妆容。至宋代，女子妆容则表现为淡雅清新，以薄施脂粉、细画蛾眉为美，与当时受程朱理学影响下的内敛含蓄之美相得益彰。而宋代禁止民间使用金器、珍珠等装饰，致使宋代妇女主要使用花冠和梳子作为装饰，甚至簪花成为宋代无论男女老少的全民时尚。此外，妆容的变化还与服饰的款式、色彩相协调，共同塑造出时代的整体审美风貌。

从这些服饰的细微之处，我们可以窥见服饰发展的整体趋势，不同的社会文化风貌、思想观念以及织绣技艺对服饰的影响，展现出不同的时代底色，渲染出了不同服饰别样的光芒。这些服饰“周边”，就像一个鲜活细胞，与服饰主体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共同织就“袞衣绣裳”中的历史画卷。

（作者单位：文物出版社）

《袞衣绣裳：中国古代服饰》

作者：赵超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 年 3 月